

# 学校教育中的再生产漩涡

## ——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研究

史秋霞<sup>1</sup>, 范艳萍<sup>2</sup>

(1. 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2. 河海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学校教育中存在许多再生产漩涡,使踏入其中的农民工子女具有三“低”特征:低学习能力、低教育期望、低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存在复制父辈人生轨迹的风险。漩涡背后蕴含着对阶层再生产的深层认识:一方面,学校教育是阶层再生产链条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既受到已有结构的影响,又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另一方面,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是经由行动者对自身生活环境的理解并最终作用于行为来实现的,集中体现在学校、教师、学生的互动较量中。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再生产;行动者;漩涡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5)04-0048-05

### 一、问题的提出

受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影响,我国升学路径有重点与非重点,职业教育和普通学术教育之分,不同类型的学校在资源、生源及师资方面差距甚远<sup>[1]</sup>。缺乏足够家庭资本、个人资本的农民工子女,更可能得到非重点、职业教育的教育机会,这对其毕业后的地位获得有重大影响<sup>[2-3]</sup>。同时,教育经历具有累积性,上什么样的中小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能够上什么样的高中,什么样的大学<sup>[4]</sup>,从而使得许多农民工子女及家长或是提前退出高考队伍,步入社会,或是倾向于选择风险小,容易获得的大学入学机会。简言之,当前教育系统的分流路径如同不同方向、高度的电梯,不同阶层的人们经过教育,走向不同的阶层位置。

再生产理论中,保德罗和埃斯达不莱认为,学校正是通过学习,并最终学业为分水岭将不同阶层的学生分配到有着不同培养目标的教育机构。玻尔斯基和金蒂斯发现,学校还通过塑造符合各阶层身份的价值和态度来实现不平等再造,例如工人阶层的学生强调规则与服从,管理阶层则强调自治与创造

性<sup>[5]</sup>。布迪厄强调的是再生产中相对独立的文化机制,以学校教育为中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亦是一个将支配阶级的“文化专断”内化为自身“惯习”的文化再生产过程<sup>[6]</sup>。可见,再生产理论看来,在由统治阶级封锁的体制中,被统治阶级的学业失败似乎是注定的。然而,由于相对忽略了对学校日常运作、个体能动性的深入分析,当学术成就与社会地位的对应关系发生动摇时,当作为文化资本表征的文凭不再为少数人所独有时,再生产理论的解释力度很难对一些新生现象给予合理解释<sup>[7]</sup>。

抵制理论不再将个体仅仅视为社会命运的被动承受者,而倾向于关注学生和教师行为的能动性和复杂性。学校教育中应该有一个辩证的人类主体概念,在此“控制”并非绝对的、静止的,而是遵从和抵制同时存在<sup>[8]</sup>。因此,不应忽视被压迫者及其行为,尤其是那些抵制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不过是使其居于边缘化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的另一种呈现方式<sup>[9]</sup>。威利斯通过纳入新的维度——文化生产,将行动者带回到再生产研究中。工人阶级的学生尽显行动者特质,建构“反学校文化”以实现自由,虽然这些为命运抗争的行为是以放弃知识获得为代价

收稿日期:2014-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SH00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13JZD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SH015)。

作者简介:史秋霞(1982—),女,内蒙古乌海人,讲师,博士,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的,而这(指知识)却可能是一种社会晋升工具或更有效的抵制工具<sup>[10]</sup>。关于“小子”们是否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子女,“反学校文化”是否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延伸以及其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均受到质疑与挑战<sup>[11]</sup>。

既然在教育与社会不平等的探讨中,目的在于阐明学校通过何种方式制造不平等,那么我们何不直接深入到教育过程中寻找答案呢?安迪·哈格里夫斯提出的以“复制策略”为基础的理论模式,试图解释社会与课堂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他认为,所有行动者都按照他们的经历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但是这种创造性会受到自身体验过的约束因素的限制。人们都服从约束因素并制订出应对它们的复制策略,并在具体运用中根据他人的反应与评价来判断策略是否有效。所谓“复制策略”是“根据一套在战术上被人接受并深信不疑的、有关教育、儿童和学习的假设”制定出来的,而这些假设旨在限制行动者所发展出的复制策略的种类<sup>[12]</sup><sup>309</sup>。

因此,如果要深入探究学校教育的社会意涵,必须去细致分析学校、教师、农民工子女面临哪些外在约束,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这些约束?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应对各自约束的“复制”策略?这些创造性的“复制”策略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后续经历的?

## 二、田野调查地点介绍

本文的田野调查地点是某市A区一个政府指定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在此称之为飞翔中学<sup>①</sup>。2009—2011年,笔者以随班跟读的方式,在飞翔中学进行实地调查。选择飞翔中学为个案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受城市化进程、“两为主”政策推行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从而更能体现结构性因素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第二,飞翔中学已形成较有特色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品牌,也是探讨学校空间下各类互动的理想场所。

飞翔中学位于该市城郊,随着现代化新城区建设不断推进,学校附近原居民纷纷搬离,本地生源相应减少。成为A区指定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也使大量本地生源躲避而走<sup>②</sup>。2007年后,A区民工学校数量锐减,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逐渐纳入A区教育系统,飞翔中学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也攀升至90%。然而,在A区“高起点、高标准和高水平”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下,飞翔中学所承担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处于边缘地位。在此环境下,飞翔中学就地取材形成农民工子女品牌教育——“蜕变”教育。

生源变化及“蜕变”教育着实给教师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原有的教学方式、进度被打破,无法得到家长的理解与合作,成就感急剧下降<sup>[13]</sup>。“蜕变”教育提高了社会关注度,反映飞翔中学教育成果的新闻报道,进驻学校观察研究的高校与研究机构,挑战教师的职业认同。有教师对这种关注就表达了不满,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教师,教农民工子女的,就是农民工”。

“蜕变”教育中,“外地人”身份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以不同方式不断被唤醒,进而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自我认同。

## 三、谋求社会职能与自身发展的生存之道

生源流失、地位边缘化、教学质量滑坡都是如今飞翔中学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在社会职能与自身发展之间寻求生存,成为其“复制”策略的主要基调。

### 1. 建立区域化管理规范

学校通过将物理空间区隔成不同的子空间,并规定不同子空间的功能与行为规范,以实现区域化管理,学生和老师在不同子空间内遵循规范进行互动。

对于学生,要准时到校、离校、上下课;统一穿着校服、佩戴校徽。班级《一日常规》更是对到校、两操(眼保健操和课间操)、上课、课间、午餐、午自习和放学做出详细规定。即便是在课下走廊、食堂等学生自主性较大的空间内,追逐打闹、大声说话都是不允许的。从学校到班级的各类规章制度规范着学校的日常生活,“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分,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sup>[14]</sup>,潜移默化地将农民工子女塑造为“准时”、“规范”、“安静”的模范生。

教师的行为规范主要针对教育投入,如要求积极参与教改课大赛、组织公开课、骨干教师示范课等教师培训。工资改革后,教师工资由两部分组成:70%的基础性绩效和30%的奖励性绩效发放标准由学校自行规定,将学校层面的考核、常规管理、特色活动均纳入标准,教师是否遵从规范直接与收入密

<sup>①</sup>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2012年暑期后飞翔中学现与其他学校合并,在A区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也再次发生变化。合并后的学校情况,我们将在其他论文中予以详细描述和分析。

<sup>②</sup>这种躲避现象在指定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并不少见,《现代快报》2008年11月18日B3版就报道了南京宁工学校随着农民工的进入,本地生源的流失现象,标题为《“名校”收不到学区生很郁闷》。

切相连。

## 2. 营造“蜕变”校园文化

学校文化是学校有意倡导的教育氛围,往往是在有意识的设计、精心策划甚至包装的过程中形成的<sup>[15]</sup>。飞翔中学凭借农民工子女的户籍身份营造“蜕变”的校园文化。所谓“蜕变”是指农民工子女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如同学校所宣扬的办学目标“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城市人”。

学校不单是社会化的场所,也成为户籍身份的转换场,而实现转换唯有遵循学校的行为规范,不断努力。飞翔中学的校训“勤”,包括“有理想”、“懂感恩”、“守纪律”、“勤学习”四层含义,很好地诠释了身份转变的具体途径,并在升旗仪式、大型会议、班会等正式场合下不断强化。随处可见的“激励”口号,进一步营造着学校空间中的“蜕变”文化。

围绕“蜕变”理念,民间舞蹈、A市历史文化、肯德基均被视为城市文化的表征,而农民工子女学习民间舞蹈,了解A市历史,可获得学校的肯德基奖励,则被视为体验成功,重拾自信,体验城市生活方式,为实现身份转变打下坚实基础。作文比赛中,《用爱融入城市》、《美丽的A市》等歌颂城市与学校如何关爱农民工子女,自身如何在关爱中健康成长,则成为彰显“蜕变”成果最有利的证明。

遵从学校行为规范不仅是模范生的应有表现,还意味着具有了城市人的品质,而那些唱反调的,不仅被戴上了差生的帽子,还将被视为难改陋习,自甘堕落的“乡下人”。

## 3. 多条“暗道”提升竞争力

对于中考无望通过的农民工子女,为了学校整体升学率,飞翔中学将他们提前从中考队伍中剔除,降低中考学生人数,以实现隐性淘汰。利用隐性淘汰提高升学率的方法并非飞翔中学特有,陕西某县中学为了凸显其“上线率”高,每年高考报名前,都私下动员各班级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转到其他中学报名参加高考或今年放弃高考报名<sup>[16]</sup>。隐性淘汰之所以能够执行下去,还在于它还是那些在正规考试中无法获得毕业证的学生的“福音”,应了访谈对象的话,“对他们(农民工子女)好,对我们(飞翔中学)也好”。这种“好”继续延伸至一些面临生源危机的中职院校,飞翔中学与一些学校形成合作关系,将隐性淘汰的学生送入这里就学,作为学生换取毕业证的交换条件之一。

为防止优秀毕业生流出影响本区高中生源质量,模拟考试前30名的学生与本区XX高中签订就学协议并给予物质奖励(自行车一辆)。“区里面卡得很严,A区的一般都在A区,B区的也很难流出B

区”也说明了内部拦截绝非某辖区的特有产品。

## 四、服从、合作与抵制并存的课堂互动

学校的生存之道为校园生活搭建了特定的舞台,教师与农民工子女根据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可能会服从规则,也可能对学校规则“阳奉阴违”,还可能发起挑战,多元复制策略下的互动构成了实际的教育过程。

### 1. 遵守规则,服从管理

戴维·哈格里夫斯依据教师与学生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互动分为不同类型。其中,“驯狮型”教师将学生看作未驯化的动物,驱使他们学习是最有益的事情<sup>[12]256</sup>。在飞翔中学教师的眼中,农民工子女无论是学习还是行为习惯,抑或家长素质,都无法与原有学生相比。消极的刻板印象已深入有些教师内心,他们甚至认为农民工子女是无法改变的,任何教育都是徒劳的,这促使教师选择赤裸裸的直接控制进行管理。班规约束、周记监控、日常惩罚是直接控制的主要手段。以初三某班班规为例,共22条,涉及奖励的只有含糊的两条,剩余20条详细说明了违反学校规则的惩罚。周记实现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监控,对其中透露出的“不屑、自私”及时打压,“重视集体、积极向上”正式表扬。校园中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惩罚,更体现出教师管理的个人情愫。在教师眼中,学生对学校规范的遵守、对教师管理的服从也是衡量学生好坏的主要标准。

农民工子女逐渐意识到自身与学校、教师之间的交换关系,即户籍身份成为学校发展的源头,服从学校“隐性淘汰”,还能获得正常考试无法获得的毕业证书等。这种认识不仅使农民工子女开始质疑学校教育价值,也知晓与学校、教师建立积极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很多学生选择向“模范生”靠拢<sup>①</sup>——表现出的一种对学校规则、教师管理绝对服从的“神态”,而未必真正认可这些约束。例如,眼保健操时,将手放在眼部不动等待教师“到岗检查”;课堂上,没听讲却时而抬头与教师互动;周记中,表达学习决心,体会教师教导,汇报班级情况等。通过积极、认真的表现给教师留下良好印象,形成积极互动。在“隐性淘汰”面前,农民工子女仍旧选择服从学校安排,参加校内中考,践行学校生存之道。

### 2. 内部合作,悬置规则

当教师与学生不认可学校所宣扬的教育理念

<sup>①</sup>所谓模范生是指相信当前所受教育能够改变他们将来的命运,并且在日常教学中积极配合教师,努力学习,在飞翔中学的快班、提优班有此类型的学生。但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对当前教育持否定态度的学生。

时,还可能以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对学校规则的表面遵从,实质悬置。他们会投入最小的精力,花费最少的时间来完成学校规定事宜,有相互欺骗,也有共同合作,最终现实在学校中开辟自我空间。

在教室,经常看到学生赶、抄作业的场景。课上,用书挡住教师视线,埋头飞快赶抄;课下,多笔抄写作业,即使字写得连自己都无法识别也全然不顾。课间很多学生便开始根据课表到其他班级寻求支援,用借来的课本、习题集来应付课堂教学。相似的行为与场景同样出现在教师群体,笔者曾在不同时间进入不同年级办公室,多数教师批阅学生作业、试卷,动作机械、速度飞快,有时一边聊天、一边批阅。即便是那些抱怨农民工子女字难认、作业差的教师也并未放慢速度。面对学校创建的特色活动,教师也可能“阳奉阴违”,例如,在“同课异构”教学活动中,整个过程包括课前准备、融入本班教学实际情况的课堂展示、课下对自己使用方式的展示、组长点评。然而,和这一活动密切相关的教案是教师之间抄袭完成,“异构”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同构”。

师生间还不无默契共同营造着“人性化”的课堂,外在赋予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形同虚设,师生“人性化”需求才是重点。旨在了解国家人防情况,增加防护知识的人防课成为电影欣赏课,“土豆网”、“优酷网”等视频资源取代指定教材。音乐课的教学内容完全脱离课本,以教授流行歌曲为主,师生对所播放的电影、歌曲的热烈讨论,共同沉浸在电影院、KTV 效果的课堂中。

### 3. 变相抵制,主动放弃

当不满学校规定与活动时,师生也会合作创造环境以宣泄情绪,此时学校领导可能成为宣泄对象。当学生抱怨校领导时,身为管理者的教师,并未及时纠正学生的言行,而是以默许的方式参与其中,实现对领导的调侃,达到对学校约束的温和抵制。

同辈群体是吸引农民工子女乐于待在学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最主要的意义托付所在<sup>[17]</sup>。同样,对于“隐性淘汰”的农民工子女,一方面他们无需参加统一中考,没有作业、课堂提问、模拟考试,甚至旷课都不会被追究,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学校不仅仅是接受教育的地方,还是结交朋友、娱乐的社交场所。即便在学校无所事事(无需参加中考),他们也会到校上课,只为娱乐。有意违规就成为主要的娱乐方式,课上,坐在教室后排讲鬼故事、看小说、同学录,或手机上网、聊天,或聚在一起评论教师着装,打扑克。课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有意大吵大闹,扰乱其他学生,还会一起嘲笑其他已被“隐性淘汰”但认真学习的学生,认为他们自

不量力。

当对以惩罚、控制为主的师生关系心生厌烦,对学校所倡导的“蜕变”教育完全质疑,当学校的娱乐无法满足内心需求时,农民工子女可能会选择最彻底的抵制方式——自愿辍学,通过主动退出学校空间宣告学校管理、教师控制的失败。

## 五、有关再生产漩涡的进一步探究

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还依靠微观层面的具体运作得以实现<sup>[18]</sup>。学校教育使农民工子女具有“三低”特征:低学习能力、低教育期望、低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即使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教育也并非农民工子女向上流动的有效阶梯,其中存在许多漩涡,使得农民工子女极有可能复制父辈的人生轨迹,落入社会底层。

学校生存之道将学校教育塑造成再生产的空间。鲍尔斯认为,经济资助的匮乏几乎就要求把学生当生产线上的原料来对待,因此它极为重视驯服和准时;而且学生也很少有机会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工作或得到教师的个别关心<sup>[19]189</sup>。对于飞翔中学来说,承担农民工子女教育不仅没有为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反而要面对本地生源流失和地位的边缘化。因此,强调纪律、追求效率成为其必需的生存策略。然而,在学校区域化的管理模式下,学习能力差的农民工子女在入学时就被遗弃。同时,挖掘的多条“暗道”直接封堵农民工子女的求学道路。向上发展没有优质高中资源,向下落入职业学校。“蜕变”文化向农民工子女传达着双重教育内涵:一是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实现户籍身份转变的过程;二是当前城市社会为其提供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如若学业失败只与自身有关,这与经济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观点一致。鲍尔斯认为,“因为学校从表面上看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一个人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描绘成不是其出身所造成的结果,而是由于他努力和才能造成的结果”<sup>[19]225</sup>。

教师成为农民工子女踏入再生产漩涡的催化剂与导火索。学校发展与教师个人利益之间存在天然依附关系,学校又将这种关系进一步强化,对教师来说,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方式就是服从学校规范。监视、惩罚为主的日常管理,速度与效率为主的具体教学,致使农民工子女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抵触、厌烦取代对知识的渴望,完成学习任务逐渐异化为逃避惩罚。同时,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教育的认知与态度既源自师生控制关系,也作用于这种关系,在他们眼中,教师俨然学校的代言人、同谋,不会全心全意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因此,激烈的师生冲突有时会同

为辍学的导火索,加速农民工子女提前进入社会。

多层互动中铸成的“反学校文化”是他们踏入再生产漩涡的直接表征。威利斯认为“小子”们盛行的抵制学校权威的“反学校文化”使他们主动放弃了向上流动的资格,自愿从事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农民工子女当中也盛行一种类似的文化,所不同的是农民工子女认可教育的价值,只是看透了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的虚假性。在他们看来,在学校关乎学习的一切投入似乎都是“不理性”的。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甘愿做差生为代价的,提前辍学不但直接放弃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进入职校或直接步入社会。辍学、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农民工子女,由于无技术无文凭很难获得体面的工作,大多跟随父母、亲戚工作,或进入无门槛的销售行业。即便获得职校文凭也无法显著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超市收银员、美容院或美发店的学徒、空调修理工、业务员等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岗位成为他们的主要去处<sup>[20]</sup>。

#### 参考文献:

- [1] 杨东平.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 刘精明. 教育选择方式及其后果[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64-71.
- [3] 王威海,顾源.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J]. 社会学研究,2012(4):48-64.
- [4] 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J]. 中国社会科学,2013(3):179-202.
- [5] 杜里·柏拉. 学校社会学[M]. 汪凌,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6] 吕鹏. 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J]. 社会学研究,2006(2):230-242.
- [7] 珍妮·H·巴兰坦. 教育社会学:一种系统分析法[M]. 朱志勇,范晓慧,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8] GIROUX H. A.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M].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1988:33-34.
- [9] 迈克尔·W·阿普尔. 被压迫者的声音[M]. 罗燕,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10] WILLIS. Learning to labo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1] PETER WOODS. Creativ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M].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5.
- [12] 戴维·哈格里夫斯,巴里·亨特. 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对教育的社会学解释[M]. 王波,译. 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 [13] 史秋霞. 城市公办学校教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认知

与困境[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4):19-22

- [14]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153.
- [15] 马和民. 新编教育社会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6] 郑也夫. 吾国教育病理[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28.
- [17] 熊春文,史晓晰,王毅. “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43-62.
- [18] 史秋霞. 互动机制下的教育与社会分层[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2):39-43.
- [19] 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0] 刘唐宇,罗丹.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9.

